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hina and the World Order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来自全球五十六位学者的洞见

主编：杨光斌　　总第十六期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中國與世界秩序評論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来自全球五十六位学者的洞见

主编：杨光斌

总第十六期

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
高等研究院
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未经允许，不得引用）

目 录

引言：百年变局与国际秩序的十字路口 1
一、秩序变迁的理论框架与历史脉络 4
二、“唐罗主义”的兴起与国际秩序的“丛林化” 12
三、大国战略博弈与全球格局重组 18
四、国际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危机与重构 25
五、地区安全热点与东亚战略格局 31
六、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全球角色定位 36
七、走向新秩序的路径选择 44
附件：文章目录 49

引言：百年变局与国际秩序的十字路口

2026年，世界政治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重组。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后，以一系列令人瞠目的单边行动——从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强索格陵兰岛，到对盟友挥舞关税大棒、退出诸多国际多边机制——将战后美国亲手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崩塌边缘。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那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死亡”的宣告，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的集体焦虑与深层困境。

秩序转型从来就不是单一维度的线性进程。权力、制度、规则与认同等要素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当前世界所面对的，是多个因素的“同频共振”：权力层面，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持续重塑全球战略版图；制度层面，核心多边机构的功能性失灵与代表性不足并存；规则层面，战后秩序的主要缔造者正在主动解构自己所建立的规范体系；认同层面，长期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叙事遭遇来自多元文明的身份自觉与话语挑战。这四个维度的交织互动，决定了本次秩序转型的深度和广度都将远超二十世纪末冷战终结时所经历的那种相对平稳的体系调适。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并衍生了全球公认的一系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是否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西方的手中呢？今后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主导力量又会

有哪些变化？这都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展开讨论提供了很好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杨光斌教授为代表的全球五十六位顶尖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不同理论传统出发，对世界秩序的剧变发表了深刻洞见。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本次学术讨论的五十六位学者在地域分布与理论背景上的高度多元性，本身就构成了一幅具有解读价值的知识政治图景。这些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俄罗斯、英国及欧盟国家和地区等地，其学术背景涵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全球南方视角等，代表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最广泛的华语专家学者。

本报告旨在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性梳理、批判性分析与综合性评述，以期为理解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机制、路径方向与未来前景提供一个全景式的知识地图。他们的观点张力——无论是对格局走向的乐观判断还是审慎预警，无论是对中国战略选择的积极倡导还是保留性质疑——反映出了转型时代本身所固有的认知复杂性。正是在这些多元声音的交汇与碰撞之中，本报告力图提炼出具有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核心命题，为理解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提供一幅尽可能完整的知识地图。

本报告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国际秩序正从基于规则的治理向基于实力的博弈加速转变，但这并非简单的丛林法则回归，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序并

存”格局的孕育期；第二，美国霸权的不可靠性已成为结构性的时代特征，特朗普的“唐罗主义”既是这一特征的产物，也是其加速器；第三，中国正面临从秩序参与者向秩序塑造者转型的历史关口，“代序崛起”而非“丛林追随”才是最具可持续性的战略选择。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支配人类行为的结构性逻辑高度相似。当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启了主权国家体系的大门，当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试图以大国协调维持和平，当 1945 年的雅尔塔体系塑造了战后秩序的基本框架，人类总是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在混乱中重建规则。今天，人类社会再次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国际秩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曲折、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是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不仅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也取决于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全球南方所有国家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国际问题研究者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不仅要客观分析形势，更要积极传播理性声音，为决策者提供审慎的建议，为公众提供平衡的视角。这份报告所汇聚的五十六位学者的智慧，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秩序变迁的理论框架与历史脉络

（一）秩序失控的历史纵深：从威斯特伐利亚到雅尔塔

要理解当下的世界秩序危机，必须将其置于四百年来的文明与历史纵深中加以审视。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概念工具与理论预设，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均势逻辑还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其经验根基源自西方国家的斗争与和解过程。而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权力再分配，更意味着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挑战。当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截然不同政治传统与历史文明的行为体深度嵌入国际体系时，既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便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东亚文明传统中对天下大同的强调、对“和”的传统的注重、对道义感召的追求，为国际秩序的演进提供了超越西方经验的替代性资源与实践可能。

杨光斌教授指出，世界政治是一个由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文明形态共同构成的整体性结构。他提出了“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这一极富原创性的分析框架。他指出，一战前和二战前的“丛林世界”的主要玩家就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不同民族国家，“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体或文明体有着与生俱来的帝国主义属性，而那个时代的非西方国家处于任帝国主义宰割的地位。”但与历史不同的是，如今中国——“一个在政治制度上和文明属性上，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异质体’，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更关键的是，“过去的中国还是因变量，如今，中

国是影响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杨光斌教授的这一判断，为我们理解中国在新秩序构建中的角色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支点。[1]

杨希雨指出，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历史上最接近“全球统一规则”的时期。这一体系基本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冷战的爆发很快使其陷入美苏两极对抗的双重结构。冷战结束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民主西方”和“全球南方”两大板块的多边整合，这一秩序面临“制度代表性不足”与“功能性失灵”的双重挑战。人类社会正走到“第四个国际秩序”终结的十字路口，第五个国际秩序究竟是“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将取决于主要大国的战略抉择。[2]

杨恩辉则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类比。他将当下的全球化秩序终结比作“周天子势微”的阶段——“礼制尚存，但执行力丧失”。在他看来，当核心国家不再愿意为“体系稳定”承担超额成本时，世界不会立刻陷入全面混乱，而是进入一个“多中心博弈阶段”，其特征与春秋战国高度相似：秩序碎片化但规则尚未完全消失，冲突常态化但全面战争受控，联盟高度灵活化且以议题和利益为核心不断重组。杨恩辉预测未来十到二十年世界将呈现五个趋势：世界不会重新“统一”而会长期

[1]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

[2] 杨希雨（国观智库客座高级研究员）：《第五个国际秩序：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

“并存博弈”；国家竞争核心从“资源”转向“系统能力”；中等国家的战略空间反而扩大；企业与个人将直接面对“地缘结构”；真正的创新将越来越来自“横向破局”。[3]

张晓刚则从价值观变迁的角度提出了重要观察。他认为，自进入特朗普 2.0 时代后，美国对外政策愈发显露出强权特征，“传统的共同价值观导向的国际关系正日渐让位于利益优先导向的国际关系”。他分析了三个深层因素：基于价值观输出所造成的地缘动荡反噬了欧美国家；源自西方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警示作用已渐趋弱化；围绕供应链的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张晓刚的判断是：“真正的国际新秩序，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利益共生中寻求价值共识，在互利合作中构建稳定框架。”[4]

（二）“丛林法则”的话语建构与概念反思

“丛林法则”这一概念在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广泛流通，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知识现象。该话语借自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隐喻，隐含了国际政治现实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溯其思想谱系，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激进主张，到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战争性描绘，再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生存竞争逻辑扩展至国家间

[3] 杨恩辉（加拿大渭铁卢大学校级最高荣誉终身教授）：《从周天子势微看当代世界秩序演化》

[4] 张晓刚（长春师范大学教授）：《国际秩序演变的新趋势：从共同价值观主导向利益优先主导转变？》

关系的理论努力，“丛林法则”的话语建构始终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者正当化其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反思现实的同时，应将基于共同安全的合作模式、基于文明互鉴的交往范式、基于发展共享的治理理念等替代性秩序纳入到研究的重点。

针对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赵宏伟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丛林法则从来都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或说基本法则，自然法则。所谓人之初性本恶，国之初性本霸。”他认为，至今为止的国际秩序都是其底层法则之丛林法则的上层建筑，大体经历了封建争霸、殖民争霸、国民国家争霸、同盟称霸等六个模式。在这一意义上，当下所谓“丛林法则回归”并非秩序底层逻辑的改变，而是其上层建筑的脱落。[5]

李汉松从一个更为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丛林法则”这一话语本身。他提醒我们，“丛林法则”这一概念“正是航海殖民、帝国扩张时代西方近代早期对异域生态的政治想象”。在他看来，与其说我们正退回“丛林法则”，不如说我们需要反思：“惧怕新世界的不确定性，是不是因为我们依赖旧秩序的稳定性，甚至在现行全球支配体系中匡床蒻席，优哉游哉，直到这个体系的创建者开始自毁墙垣，才手忙脚乱？”李汉松借用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指出，世界并非退回“无政府”状态，而是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序”阶段——“具体‘规范’愈受挑战，我们

[5] 赵宏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丛林法则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 中国是例外》

愈有必要回到共同‘规范性’诉求，反思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形式”。[6]

孙太一则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判断：“世界并不是因为‘没有霸权’才走向丛林，而是因为‘霸权不再愿意承担秩序责任’，才让丛林法则重新获得生命力。”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当前的“丛林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多极均势自发生成的结果，而是一个由美国这个原本应当承担秩序维护角色的核心国家主动“去规则化”所引发的外溢效应。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未来美国的政治方向发生变化……丛林法则并不是一个历史终局，而更像是一个由美国国内政治驱动的‘窗口期’”。[7]

刘西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提供了深刻警示。他指出：“当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国家或个体的强势行为，而是规则逐渐退居幕后、以实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国际交往互动中被越来越多的组织和行为个体接受为常态。”他引用古代文物的观察视角指出，“契约文书、度量工具与货币”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长期稳定并不依赖持续施压而取决于背后规则是否清晰、是否公平、交换是否可预期以及公共供给是否能够持续。[8]

---

[6] 李汉松（美国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从失序到多序：超越区域霸权与选择支配》

[7] 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丛林法则只是插曲，中国面对的是“代序崛起”的历史时刻》

[8] 刘西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从规则到丛林》

（三）秩序转型期的结构性动力

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开放市场、稳定货币与产权保护的功能性需求；而这一秩序在当下的系统性危机，也恰恰根植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金融脆弱性累积与生态不可持续性等结构性矛盾。当美国国内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与其所建立的全球治理框架产生根本性冲突时，秩序的合法性面临严重冲击，其局部性自我解构也成为难以回避的趋势。这一分析路径提醒我们，对世界政治与国际秩序变迁的理解不能忽视世界市场、政治思潮与资本流动等更为深层的基础性变量，而停留在国家间权力政治的表面。

武心波将当下的变革定性为一场深刻的“全球秩序重构运动”，其核心逻辑是“以美国资本集团的政治诉求为内核”，“从势力范围划分到国际组织迭代，从区域格局重塑到全球秩序重置，正系统性改写21世纪国际政治的底层规则”。他认为，特朗普革命“绝非个人政治行为，而是美国资本集团集体诉求的政治外化”，遵循“破立结合”的核心逻辑，形成了“革命筑基—规则赋能—全球蔓延”的完整链条。[9]

蔡彤娟提供了一个更为审慎的格局判断。她认为当今国际格局已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一超多强”，而是处于向“相对去中心化的多极结构”过渡的阶段。美国仍在综合

[9] 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特朗普革命”一场深刻的全球秩序重构运动》

实力、制度外溢和规则塑造方面保持显著优势，但其“超强”的边际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系统性上升使全球权力结构呈现出“双核心牵引、多节点分布”的特征。她将其定义为“准多极”格局——“更像是不稳定的过渡形态，而非稳态的一超多强”。[10]

储昭根则从相反的视角提出了“单极时刻回归”的论点。他认为，尽管多极化呼声不断，但美国在伊朗、加沙与委内瑞拉三条战线上的同步行动表明，“特朗普总统重新掌握了全球战略节奏，使美国在继二战与冷战之后，再度进入一个由自身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时刻’”。他进一步指出，“全球格局从未真正进入所谓的‘多极时代’”，美国依旧是“唯一具备全面力量体系与全球战略能力的国家”。这一判断虽然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左，但提醒我们不可忽视美国硬实力的现实威慑。[11]

庄伯仲则从“媒介帝国主义”的视角提供了独特分析。他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与军事力量日益多极化，“美国仍藉由 CNN、好莱坞、Google、Meta 等大众媒体与网络平台巨头，牢牢掌控国际话语权”。他认为“此一媒介帝国主义不仅输出美国价值与政治叙事，更透过文化符码的日常化渗透，巩固其超强软实力，形塑非对称的‘一超’优势”。庄伯仲的判断是：“媒介层面的国际秩序仍呈现

[10] 蔡彤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一超多强”到“准多极结构”：全球权力格局的过渡性特征》

[11] 储昭根（浙江理工大学）：《“单极时刻”回归：美国正重塑全球秩序》

‘一超’，‘多强’诸国若未能建立自主传播体系，将持续处于话语边缘。”[12]

祁冬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比较视角——“西方闹‘文革’，东方谋发展”。他认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作为“最有权势”的国家，采取了“造反”式的非常规手段，在西方阵营对自己的盟友掀起的阵阵波澜，是要改变令自己不满的旧秩序，这背后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动力。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定力，恰恰因为“过去四十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信奉的是发展主义”。他指出，“深谙发展主义的中国因此和特朗普是有些共同语言的”——“非自由派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说到底也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13]

王在邦则从“忽悠”的角度解读了特朗普的冲动。他认为，特朗普的激进举动可能“只是为了在没啥政绩可以炫耀的情况下，借此制造议题，吸引选民关注，增加选民凝聚力”。他的判断是：“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冲动很难得手，即便得手也不可能长久。”其理由是“处在风雨飘摇的下行通道中”的美国，“不管世界大变局如何演变，绝大多数国家人心思稳盼安求发展”。[14]

---

[12] 庄伯仲（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在“媒介帝国主义”视角下，仍是“一超多强”格局》

[13] 祁冬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方闹“文革”，东方谋发展》

[14]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冲动很可能就是忽悠》

二、“唐罗主义”的兴起与国际秩序的“丛林化”

（一）“唐罗主义”的内涵与实质

特朗普第二任期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倒退特征——从二战后以制度霸权为主要形态的新帝国主义模式，退回到十九世纪以直接领土控制与资源掠夺为特征的古典帝国主义模式。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特征，被学界普遍概括为“唐罗主义”——即“门罗主义”与其名字“唐纳德”（Donald）的谐音的结合。美国建国者话语传统中对“帝国”身份的自觉认同，打破了美国政治文化中长期存在的自我神话——即将自身描绘成反帝国主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与自由民主价值的传播者。特朗普将墨西哥湾更名、觊觎格陵兰岛、威胁吞并加拿大、声称消灭伊朗文明等直白言论与行动，撕下了美国外交政策长期披挂的道德面纱，使其帝国主义的实质暴露于国际舆论的审视之下。这种去道德化的外交转向不但显著损害美国的国际合法性和软实力，也消除了分析者长期需要穿透意识形态迷雾才能触及的权力政治内核。

高梓菁指出，“唐罗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美国只关心西半球的治理，因此不应过多介入东半球事务；相对应地，东半球国家也不应干预美洲事务。”刘佩怡进一步分析指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门罗主义”复归，而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升级版，“这是其与最初门

罗主义最大的差异”。[15] 王建伟的分析更为尖锐。他指出，虽然很多人喜欢谈论特朗普外交的所谓“战略收缩”，“实际上他上台之后推行的却是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都望尘莫及的扩张主义外交”。从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试图吞并格陵兰岛，扬言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使用武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到处抢掠关键矿产资源，奉行赤裸裸的‘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16]

李海默从美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极具深度的维度。他指出，“‘帝国’这个词对于美国的国家建构而言是个古已有之的词，根本不需要等到门罗的时代”。他援引了美国建国者的大量原始文献加以论证：亚当斯 80 年代即曾公开宣称“It is an Empire”；华盛顿 1783 年明确使用了“our Empire”的表述。李海默的结论是：“自诩所谓‘（捍卫）自由的帝国’实在乃是自美利坚立国之初就已昭昭显明的一个长期存在的话语传统。”[17]

谢韬借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名言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设计一个由人统治人的国际秩序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得霸权国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国家，其次是强制霸权国控制自己。”他指出，“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基本上控制了自己的行为，给世界

[15] 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会抽走我们脚下的梯子”：日本对“唐罗主义”的忧虑》
[16] 王建伟（澳门大学教授）：《特朗普何以能重温 19 世纪的旧梦？》
[17] 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美利坚的久远帝国传统》

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诸多言行表明，美国已经不再控制自己的行为。”[18]

（二）“唐罗主义”的实践表现：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

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所采取的“执法绑架”模式，代表了一种危险的国际实践，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并谴责这对国际法律秩序的破坏效应。传统国际法严格禁止一国对另一国主权领土内人员实施武装抓捕，这一禁令的唯一例外是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集体安全行动或明确的自卫权行使。然而美国政府通过认知战将外国元首重新定义为由本国法院通缉的“毒枭”，再以此为依据派遣特种部队实施跨境抓捕，实质上是以国内司法程序为外衣绕过了国际法对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这种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以单边司法程序替代多边授权机制的做法，如果被其他国家效仿，将严重挑战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安全法律框架。

张东宁针对特朗普破坏国际法的行径进行了深度剖析。他指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孤立主义回潮，而是霸权国在实力透支阶段的地缘战略收缩”。特朗普政府绑架马杜罗、威逼加拿大、觊觎格陵兰，“并非实力膨胀所致，而是战略资源不足情况下向周边区域的战略性收缩”。他特别分析了委内瑞拉行动的模式：“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并非传统的‘主权入侵’模式，而是通过认知

[18]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关系进入剧烈动荡期》

战将马杜罗定义为‘毒枭’，利用长臂管辖和特种作战进行‘执法绑架’。”[19]

刘佩怡则从地缘政治的更大图景分析了“唐罗主义”的外溢效应。她指出，如果丹麦与加拿大最终退让，“欧洲如果妥协，中俄也仅会作壁上观；欧洲如果竭力反对，北约便可能因此瓦解”。她进一步将分析延伸到亚太地区，指出在日本部分人士推动“正常国家化”的背景下，“可以预期，中日之间的冲突将更激烈化”。[20]

韩荣斌的判断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采取快速行动而国际社会没有实质性应对，“其本身依然是当世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实力依然超群”，这是关键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各国依然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协调的应对之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中美之间游移”。[21]

钟厚涛则从心理战的角度分析了马杜罗事件对台湾的影响。他指出，赖清德“自我代入感极强，瞬间陷入‘末日恐慌’，重新检验‘逃生之道’，紧急加强‘反斩首’演练”。他进一步分析了马杜罗事件对台湾政治的影响，提出了“马杜罗模式”的概念，认为这加剧了赖清德的“刚愎自用和用人多疑”，“进一步恶化台湾当局高层‘小圈子决策’模式”。[22]

---

[19] 张东宁（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美国“唐罗主义”的收缩与中国“战略定力”的隔空博弈》

[20] 刘佩怡（国立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主任）：《“唐罗主义”影响的不只是美洲》

[21] 韩荣斌（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22] 钟厚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今日马杜罗，明日赖清德？》

（三）美国霸权的“反噬”与内在矛盾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的核心功能在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其回报则体现为体系稳定所带来的长期利益。然而特朗普政府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成本收益计算逻辑——不再将公共产品供给视为维系体系稳定的投资，而是将其视为对美国资源的不当消耗与对他国的不公正补贴。这种认知框架的转变虽然在短期内迎合了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盟友的战略疏离与体系的离心化趋势。当霸权国无法为体系成员提供可预期的未来行为模式时，其霸权合法性便丧失了最根本的根基。盟友基于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预防性战略调整，将进一步削弱霸权国赖以行动的制度网络与伙伴关系。

尽管特朗普的行为展现了惊人的强势，但多位学者指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自毁性。吴白乙认为，美国的“破坏性创造”无疑服务于延续其霸权的战略目标，但“特朗普的执念和蛮横做法必然对霸权产生巨大的反噬作用”。他分析了三个层面的反噬：首先，“美国所有的大动作必须以打乱以往数十年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为代价”；其次，“美国放弃现存多边规则框架，本质上是为了提升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效率，但牺牲的却是霸权的美誉神话及其‘大国自律’底线”；第三，超级金融帝国主义的潮汐性收割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全球资本安全锚地的地位。[23]

[23]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教授）：《美国霸权与世界变局》

赵光锐从“可靠性”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分析框架。他指出，“霸权国提供的最重要的集体物品是未来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但由于美国“物质生产能力和内部秩序出现了巨大问题”，不仅导致其“承诺能力”不断减退，而且促使生成“霸权国利益绝对第一”的认知模式。这种“不可靠性”将加速盟友从霸权体系中脱离出来和世界的多极化进程。[24]

李宗伦则从同盟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更为悲观的判断。他认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对于拜登政府建立的大西方同盟是毁灭性破坏”，“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这一箴言正在得到充分验证。他指出，格陵兰事件“暴露了西方同盟内部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美国‘内外通吃’的丑恶嘴脸”。[25] 赵建民则从台湾视角分析了“唐罗主义”的道德后果。他指出，虽然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强势作为“确实也重挫了中国在拉美的布局”，但“川普的举动却同时也断送了劝阻中国透过不同方式对台遂行统一的道德制高点”。[26]

[24] 赵光锐（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霸权的“不可靠性”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25] 李宗伦（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世界大变局与美国同盟体系的消亡》
[26] 赵建民（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唐罗主义让美国失去道德制高点》

三、大国战略博弈与全球格局重组

（一）从“一超多强”到“两超多强”：格局转型的辩论

当前格局变迁的核心特征在于权力转移过程本身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倾向于将霸权更替描绘为一种相对可预测的线性过程——即挑战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最终导致其军事实力超越守成国，从而引发体系性的霸权战争或和平过渡。然而当代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却呈现出多维复杂性。在此背景下，关于当前国际格局的性质，学界存在激烈辩论。

任晓的观点代表了多数学者的共识：“国际格局正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其中美、中两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国。”他认为，“格局的转变是以力量对比的转变为基础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一定会引起格局或体系的变化”。202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美、中两强“近乎比肩”（near-peer）加以体认，“估计这一趋势仍将继续”。[27] 韩荣斌则提出了“两强+”（G2 Plus）的概念，认为“两强就是中国和美国，Plus 则涵盖欧洲（欧盟整体及几个主要成员国）、俄罗斯、若干中等强国、中小国家联合组织，以及地区性组织”。他审慎地指

[27] 任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

出，“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嫌隙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取舍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定力”。[28]

刘江永的分析更为细致。他认为“一超多强”确切地讲不是世界格局，而是对大国关系格局的概括。他指出，“世界格局开始呈现‘中美两超与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但既非‘中美两极对抗’也非‘中美 G2 合作主宰世界’”。他特别分析了特朗普决策的核心逻辑动因，认为其惯用手法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其核心决策逻辑动因之一是美国股市；其帝国地缘扩张野心膨胀，南北通吃，欺软避硬”。[29]

蔡彤娟则从全球权力结构的“梯度”特征出发，指出“单极和多极始终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而非实体性状态”。她提出了“梯度极”的概念，“即在同一时刻存在多个不同层级的力量中心，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行为能力和议程范围”。[30] 这种非线性、多层次的权力分布格局提醒我们，避免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当代国际格局。

冯玉军则从国际格局评判方法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建议。他指出，要“调整长期以来单纯以 GDP 衡量国际力量对比的陈旧方法”，“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实力综合指标（CINC）以及综合国力净资源等多元维度引入国际格局评判体系”。[31]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权力本身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下的格局转型是关于

[28] 韩荣斌（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29]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2026 年世界格局与中美日对外战略走向》
[30] 蔡彤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一超多强”到“准多极结构”：全球权力格局的过渡性特征》
[31] 冯玉军（北京大学教授）：《全球失序，中国何为？》

未来权力将以何种形式存在、以何种方式运作的深层变革。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时代，数据资源、算法能力与技术标准制定权等新型权力来源需要被纳入传统的以领土、人口与 GDP 为核心的国力评估体系。否则，决策者和研究者可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与数字治理博弈中做出严重误判。

（二）中等强国与全球南方的战略觉醒

回顾国际关系史，每一次两极格局出现松动迹象时，中小国家往往会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秩序震荡中，中等强国的角色演变与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当前格局变迁下，美国的霸权收缩释放了大量的制度空间与议程真空，而新兴国家的体系性崛起又尚未形成完整的替代性制度供给，这一过渡性阶段恰恰为中小国家通过创造性外交、制度改革与议题联盟来拓展自身战略空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杨恩辉将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的讲话比作“苏秦‘合纵’思想的现代版本”。他指出，在“全球警察”角色退场之际，中等国家必须通过横向联合，“共同构建可生存、可谈判、可博弈的空间”。[32] 崔岩则从路径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中等强国的战略转向。他指出，“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这一现实逻辑正在迫使中等强国做出选择。他认

[32] 杨恩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校级最高荣誉终身教授）：《从周天子势微看当代世界秩序演化》

为，“加拿大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旧秩序不会自动回归的现实，“提出了提升自主空间和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张”。[33] 张望则从日本视角分析了中等强国的战略抉择困境。他指出，高市早苗首相“展开了一场旨在争取战略主动权的政治赌博”，其核心目标是“为2026年即将启动的日本安全保障架构改革蓝图铺设稳固的执政基础”。[34]

蔡彤娟从全球权力结构的“梯度”特征出发，指出“单极和多极始终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而非实体性状态”。她提出了“梯度极”的概念，“即在同一时刻存在多个不同层级的力量中心，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行为能力和议程范围”。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和中国位于“第一梯度”，俄、日、德、印位于“第二梯度”，其他中等强国位于“第三梯度”。这一分析工具为我们理解复杂的全球权力分布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

吴白乙从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角度，强调了中国战略的独特性。他指出，面对特朗普的“破坏性创造”，“中国并没有完全被卷进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攻防战’当中”，“而仍以发展为导向，以和平为政策目标，与美国及其追随者维持着对话关系和斗而不破的基本态势”。[35] 石之瑜则从更为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了整个国际秩序的本质。他认为，所谓国际秩序崩坏“是继殖民宗主国根据他们之

[33] 崔岩（辽宁大学教授）：《国际秩序重构：规则变更与路径选择》
[34] 张望（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高市早苗与中等国家战略的抉择》
[35]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教授）：《美国霸权与世界变局》

间利益折冲，瓜分世界，并经历多次战争之后，又一次因为分赃不顺利，垄断利益倾斜，因而再次发生的殖民主义茶壶里的风暴”。[36]

罗欢镇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命题：“继续推进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他坚决反对“把美国等同于全球化”的观点，指出“美国不是全世界”——“无论人口规模（3.4亿，占4.2%），还是GDP（29万亿美元，占26.2%），都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37]他进一步论证了“没有美国的全球化”的可行性。他指出，“2016年由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越南等12个国家签署的TPP并没有因为特朗普1.0的退出而终结”，相反，这些国家“将TPP转化为CPTPP，继续推进全球化”。他还强调，中国在全球化2.0中的角色不可替代：“自特朗普1.0以来，中国在不断苦练内功的同时，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实际上承担起了推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重任”。

（三）西方世界的分裂与“西方的终结”？

“西方”作为一个统一文明单元与地缘政治阵营的逐步分裂，是本次秩序转型中一个深刻而持久的结构性变迁。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一体化进程催生了欧洲特有的规范性认同，使其在安全政策与经济利益上日益寻求独立于美国的自主空间；北约东扩带来的新成员则增加了联盟内

[36] 石之瑜（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际秩序要是真的失控就好喽！》
[37] 罗欢镇（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继续推进没有美国的全球化》

部地缘政治关切的多样化，削弱了战略共识的凝聚力。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将长期积累的内部分歧公开化与极端化，使其达到了难以通过外交辞令掩盖的程度。

针对加拿大在政治层面公开质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张勇进以《西方的终结？》为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从2026年达沃斯论坛传递的信号出发，指出“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早已被其主要缔造者亲手撕裂，如今已然彻底消亡、不复存在”。他还指出，“跨大西洋盟友之间，乃至更广意义上曾被视作整体的‘大西方’阵营内部，尽管拥有共同价值观，分裂却远胜于团结”。[38] 西方世界的分裂并非始于特朗普，而是有其深层根源。他认为，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源于“美国将其自身利益置于盟国利益之上”的长期趋势。特朗普只是将这一趋势“公开化、极端化”了。张勇进援引卡尼的演讲指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死亡”，而西方的应对之道在于“价值现实主义”——“在坚持西方基本价值观的同时，立足发展本国各方面的实力，加强战略自主”。

杜进的分析聚焦于加拿大和日本的不同反应。他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赢得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讲演”，其核心主张与“日本战略研究圈探讨的

[38] 张勇进（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西方的终结？》

范围”并无二致——即中等强国合作。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政府不公开反对特朗普的霸凌？”杜进的答案是：“政治劣化妨碍了日本追求战略自主性”。[39] 殷燕军则从 G7 盟友的处境出发，揭示了西方阵营的深层裂痕。他指出，“G7 盟友们差不多都会被美国赶下餐桌，甚至放进菜单里”。他发出的警告令人警醒：“须思考，连曾经的列强都已踢落神坛，可能在大变局中被淘汰。那么新时代的国际秩序与规则的制定者，将有哪些？”[40]

李宗伦对西方同盟体系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过去的‘价值观的认同’‘意识形态的统一’作为二战之后‘美国同盟体系’的基础……现在‘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同盟的充要条件，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利益’”。这一转变的深层含义在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从“价值共同体”降格为“利益交换体”，其凝聚力和持久性都将大幅下降。他的分析指向了一个结构性趋势：西方世界正在从冷战时期的团结阵营裂变为各自为战的地缘政治行为体。

[39] 杜进（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日本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里挣扎》
[40] 殷燕军（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战后秩序与利益共享：因应川普暴走》

四、国际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际法的困境

国际法的角色是当前秩序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随着美国霸权合法性的衰退与主动的制度破坏行为，国际法传统上所依赖的执行基础被系统性削弱，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却合乎逻辑的现象：规范与制度复杂度在持续增加，而有效性却在同步下降。这种落差恰恰是制度变迁理论所描述的适应性危机——当制度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经济环境的需求变化时，便会面临功能性失效的压力。

黄海涛以“‘后霸权秩序时代’国际法的消亡与重生”为题，深入剖析了国际法面临的危机。他指出，当特朗普宣称“他不需要国际法，作为三军统帅，他的权力仅受‘自身道德’限制”，而斯蒂芬·米勒“教导”媒体“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由实力、武力和权力统治的世界”时，“权力逻辑迎头暴击了习惯于遗忘二战后的秩序属性叫做‘霸权’的国际社会”。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理性的胜利，而只是权力最为粗粝野蛮一面的显现”。[41]

黄海涛的分析最具启发性的部分在于他指出了危机中的机遇。他认为，“恰恰是霸权的退场与失序的风险，为国际法的‘重生’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他预判，“如果说‘霸权秩序’时代的国际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

[41] 黄海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后霸权秩序时代”国际法的消亡与重生》

训’，那么‘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法将更多呈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赋权’”。这套重生的法律体系“必然更少理想主义色彩，却可能更具韧性，其合法性不再源于单一文明的普世叙事，而是建立在多元力量对‘最低限度秩序’的共同需求之上”。

宋伟则持更为坚定的维护立场。他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二战后国际关系的进步成果，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他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应该被指责的是践踏这些规范的国家”，而非国际法本身；第二，“在中小国家不得不依靠这些规范、机制来捍卫自己的安全”的背景下，国际法的作用“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第三，“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从长远来看只会让所有国家都陷入不安全的境地”。[42]

张畅从国际法规范变革的角度提供了重要洞见。他认为，“国际法并非终结，只是改变了用法”。他提出，“表面上的法律失灵……实际上国际法正从‘统治性规范’转变为‘博弈性规范’”——“前者强调普遍遵守，后者强调策略运用”。[43] 孙雯则从历史传统中找到了维护国际法的智慧。她援引了布赖尔利的睿见：“没有人比国际法的敌人更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它当作无用的乌托邦来攻击，也没有人把它当作万灵药来捍卫。”孙雯指出，“如

[42]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法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作用》

[43] 张畅（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国际法失灵了，还是正在被重写？》

果我们放弃规则，那就意味着接受了无止境、无节制的实力较量”。但她同时强调，“规则本身不等于公正，但它是实现公正的基础框架”。[44]

（二）国际组织的迭代：从“退群”到“建群”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其制度设计深深反映了当时的权力结构、技术条件与治理需求。特别是，在经济治理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加权投票机制反映了各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差异，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框架适应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议程。然而经过八十余年的体系演进，全球经济版图已发生根本性重塑，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使得既有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与代表性严重不足，而技术革命与全球性问题的新挑战又对国际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主动“退群”行为虽然带有明显的单边主义色彩，却客观上为国际组织的改革与替代性机制的建立创造了制度空间。

武心波则从规则制定权争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退群”与“建群”。他认为，“特朗普政府通过否定联合国等战后国际组织，消解旧体系对美国霸权的约束，同时推动‘和平委员会’等新型组织的构建，试图打造一个美国主导、规则可控的国际治理新平台。”美国的“退群潮”本质上是对传统国际组织“去美国化”倾向的反击，更是规则制定权争夺的关键举措。这种操作核心是让国际组织

[44] 孙雯（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看国际法的作用》

重新成为服务美国资本利益与霸权巩固的工具，而非多边主义制衡霸权的载体，从而完成国际治理规则的底层改写。[45]

宗华伟从国际组织创生逻辑的角度，首先对“和平委员会”进行了深刻批评。他指出，“和平委员会”看似满足了功能性需求，但其创设逻辑“完全缺乏包容性”——“相对于收到邀请的50多个国家而言，国际社会三分之二的主权国家实际上已受到了漠视或轻视”。[46]刘迪则提出了“双重国际秩序”的概念。他认为，特朗普绕开联合国的行动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出现“两个并行却彼此冲突的秩序体系”：“一个仍以联合国、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为核心的‘旧秩序’，以及一个以强权、交易和结果为导向的‘新秩序’”。[47]

（三）核秩序的致命困局

核军控体系的建立与维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深深嵌入在大国战略稳定关系之中的高政治议题。从美苏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每一项重大军控协议的达成都建立在特定的战略互信基础与力量平衡感知之上。然而，大国竞争和地区冲突的不断加剧正在逐步侵蚀大国之间关于核战争不可接受性的共同认知。一旦核禁忌的共识瓦解，人类便可能重新滑向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危险竞争逻辑。

[45] 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特朗普革命”一场深刻的全球秩序重构运动》
[46] 宗华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从国际组织创生逻辑看“和平委员会”》
[47] 刘迪（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双重国际秩序引发新风险》

多位学者的文章揭示了国际秩序失控中最危险的维度——核秩序的全面崩溃。王在邦认为，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源，“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只要中国不想打仗，其他任何国家都未必有胆量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他同时指出，“在核武器充斥世界的情况下，如果疯子掌权，核按钮失控，那是另一回事”。

詹欣指出，“当前国际核秩序面临全面失序的风险”，美国的单边主义是“核心引爆点”。从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到威胁重启核试验，美国“通过破坏核军控规则，既能放手发展新型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又能以核威慑为筹码，胁迫盟友，遏制对手”。[48] 詹欣特别警示了日本核政策的转向风险。他指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频频挑战‘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内部官员甚至公开鼓吹‘拥有核武器’”。在“奥库斯”框架下，美国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动力技术“引发日本、韩国的核效仿讨论”。他认为，“这必将引起朝鲜激烈的反应，将彻底摧毁半岛无核化的共识，加剧亚太地区的不安”。

高梓菁、熊达云同样警告了日本拥核的危险。高梓菁认为，日本正在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和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拥核意愿。[49] 熊达云指出，日本视美国要借盟国打压中国为绝好机会，已经公然打出了扩军旗号。日本不仅要修改武器

[48] 詹欣（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核秩序走向失序：当前国际战略安全的致命困局》
[49] 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会抽走我们脚下的梯子”：日本对“唐罗主义”的忧虑》

出口规则，为增加军工产业、大规模出口武器装备大开方便之门，还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为日本引进和储存核武器提供法律保障。更严重的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负责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亲信放风日本要制造并拥有核武器。他指出，这些行动清晰表明，“高市的目标指向就是要把日本引向扩军备战之路，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警惕并批判高市政权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确实理有所据，值得爱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50]

[50] 熊达云（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教授）：《必须警惕日本以“战略互惠”为幌子步步为营推进“战略遏华”》

五、地区安全热点与东亚战略格局

（一）日本的安全政策转向与战略困境

多位学者高度关注日本在秩序变动中的战略选择。日本在安全政策领域的激进转向是其决策者长期酝酿的“正常国家化”议程在有利外部条件下的集中爆发。日本对华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了中日之间的互信，更使日本自身陷入了战略认知混乱的困境。一方面，日本需要中国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本又在安全领域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这种经济依赖与安全恐惧之间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摇摆性与不确定性。

张望指出，高市早苗首相“展开了一场旨在争取战略主动权的政治赌博”，其核心目标是“为 2026 年即将启动的日本安全保障架构改革蓝图铺设稳固的执政基础”。他特别分析了日本对美国委内瑞拉行动的反应。因为美国的行动“缺乏明确的国际法授权，明显违反了日本长期以来倡导的‘不支持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原则。日本国内舆论对美国的做法普遍反应负面”。高市早苗政府对美国的行动选择以模糊表述回应，既未明确支持，也未公开批评，被外界质疑其外交立场存在双重标准。[51]

高梓菁则从日本学界的视角，系统梳理了日本对“唐罗主义”的三重忧虑。第一，“世界或进入‘以实力求和平’的时代”；第二，“‘G2’强权世界中，日本的重要

[51] 张望（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高市早苗与中等国家战略的抉择》

性下降”；第三，也是日本最大的焦虑：“‘台湾有事’时，日本或面临被‘抛弃’的风险”。[52]杜进对日本未能像加拿大那样采取战略自主立场表示遗憾。他指出，安倍时代日本曾推行过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四面作战”，但当前高市早苗政府却“没有表现出中等强国应有的姿态”。他认为核心原因在于“政治劣化”。[53]

殷燕军对高市早苗介入台海的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他指出，“连美国都要同中国交易，日本或会成交易筹码”。[54]熊达云则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揭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他指出，“战略互惠成了日本‘战略遏华’的障眼法”。他系统梳理了日本“暗度陈仓”的四步策略，特别指出高市言论与日本近代扩张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 DNA 传承关系”。[55]

（二）台湾问题的多维透视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黄旻华从台湾社会内部的认知角度，揭示了一个被外界忽视的风险因素——“同温层效应”。他指出，台湾社会存在对于大陆是否具备武统台湾实力的截然相反的认知。黄旻华警告说：“这样的认知一旦过度被强化，成为信仰而非基于客

[52] 高梓菁（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美国会抽走我们脚下的梯子”：日本对“唐罗主义”的忧虑》
[53] 杜进（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日本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里挣扎》
[54] 殷燕军（日本关东大学名誉教授）：《战后秩序与利益共享：因应川普暴走》
[55] 熊达云（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教授）：《必须警惕日本以“战略互惠”为幌子步步为营推进“战略遏华”》

观事实的评估，最终就会让理性应对两岸关系的基础不在，双方无法有效沟通，敌意螺旋不断升高，最终走向军事冲突的结果。”[56]

朱志群则提供了更为温情的分析。他认为，“只要大陆仍然将台湾民众看成是同胞，就不会忍心动武或采取其他极端手段”。但他同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代际变化：“大陆年轻世代对台湾的看法可能跟他们的长辈不一样。”他警告说：“等这一代人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对台湾还有那么多善意，那么多耐心吗？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地方。”[57]

张钧凯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台湾问题的边缘化”。他认为，在委内瑞拉事件、格陵兰风波喧嚣之际，“反而衬托出台湾问题愈加‘边缘化’，此乃世界秩序新局形成过程中的一大风向指标”。[58] 周文星从马杜罗事件的角度分析了对台湾问题的启示。他认为，该事件“为中国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学习样板：大国如何在高风险环境下使用军事力量、如何控制升级、如何应对制裁与国际反弹”。[59] 钟厚涛则从心理战的角度分析了马杜罗事件对台湾的影响。他指出，赖清德“自我代入感极强，瞬间陷入‘末日恐慌’”。他提出了“马杜罗模式”的概念，认为这加剧了赖清德的“刚愎自用和用人多疑”。[60]

---

[56] 黄旻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台湾社会对于大陆武统台湾实力评估的同温层》
[57] 朱志群（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委内瑞拉模式会在台海上演吗？》
[58] 张钧凯（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研究员）：《台湾问题边缘化，台海终局脚步近？》
[59] 周文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马杜罗被捕事件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60] 钟厚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今日马杜罗，明日赖清德？》

（三）东亚安全困境与中国周边战略

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秩序重组节点。在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安全制度框架的背景下，中日这两个地区最大经济体与最主要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东亚安全复合体是向着合作安全还是对抗安全方向演化。当前世界正滑向一个“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丛林时代，经济纽带被安全化利用的新趋势，对传统以经济相互依存促进政治互信的理论假设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段瑞聪从防止地区失控的角度，强调了中日关系再定义的紧迫性。他指出，在东亚“缺乏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安全与稳定框架”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否，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东亚整体安全环境”。[61] 刘洪钟则从更宏观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东亚战略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当前“世界正滑向一个‘武器化相互依赖’的丛林时代”，面对这一变局，“中国的战略选择更需清醒、理性和智慧。效仿美国的霸权逻辑不仅违背中国‘不称霸、不搞势力范围’的外交承诺，更将破坏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和平稳定局面，无异于自断前程。”。[62]

卫娣则系统论述了中国在东亚的“定力与担当”。她明确指出“东亚不是‘后院’，中国拒绝‘门罗式’逻辑”。她以详实的数据证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经济上，

[61] 段瑞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62] 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秩序坍塌背景下中国的东亚战略更应理性担当》

“2025 年中国 GDP 占全球约 17%，制造业增加值超美欧总和”；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理念上，“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构建起系统性替代方案”。[63] 吴川则秉持更加谨慎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形态高度依赖区域经济网络、全球产业链和外部市场稳定。这意味着，中国的力量并非像美国那样可被频繁用于施压与越界”。他指出，“一旦在东亚采取高压主导路径，经济、金融、供应链与周边政治反弹将首先由自身承受。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结构问题”。[64]

[63] 卫娣（日本周南公立大学讲师）：《中国在东亚的定力与担当》

[64] 吴川（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六、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全球角色定位

（一）“代序崛起”：超越丛林法则的中国路径

在这一轮国际秩序剧变中，中国的战略选择成为全球学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崛起常常体现为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战争推翻既有秩序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崛起，如德意志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尝试；二是在既有秩序内逐步积累影响力的渐进性崛起，如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复兴。“代序崛起”所描述的是第三种模式——既不是对既有秩序的暴力推翻，也不是对既有秩序的被动适应，而是在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主动放弃其职责、秩序本身面临崩溃风险时，崛起国有选择地接管秩序维护功能、优化秩序运行机制、提升秩序包容性与代表性的创造性崛起。因此，孙太一提出的“代序崛起”概念，是本轮学术讨论中最具理论创新性的贡献之一。当然，“代序崛起”并非没有风险：过度承担国际责任可能消耗国内发展所需的资源，也可能引发其他大国的制衡反应。如何在积极参与与审慎克制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是对中国战略智慧的重大考验。

孙太一指出，中国此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分叉口”。他系统阐述了“代序崛起”的内涵：“所谓‘代序’，不是推翻秩序，而是接管并优化现有秩序；不是通过暴力摧毁规则，而是在他人放弃规则时坚守规则”；“不是急于证明自己能成

为‘最强的野兽’，而是让世界逐渐意识到，只有中国仍在认真对待秩序本身”。他进一步分析了为何中国不应选择“丛林法则”路径。尽管“顺势融入丛林法则的逻辑”看似顺理成章，但这条道路“虽然可能带来某些短期收益，却意味着北京必须主动放弃自己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最大战略资产：制度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更重要的是，“丛林法则意味着高强度对抗、长期军事动员与结构性经济风险”。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Never interrupt your adversary when he’s making a mistake（当你的对手正在犯错时，永远不要去打断他）。今天的美国，正在系统性地破坏自身的战略信誉与道义资本。”因此，“最优策略并不是模仿这种行为，而是让这种错误自然累积、自然发酵”。[65]

王文从全球领导力的角度强调了中国的差异化选择。他认为，“对于特朗普试图再造的‘丛林法则’，中国非但不能效仿，还应展现以协调和遏武为主要力量的全球领导力”。他指出，“拿下格陵兰，意味着大西洋关系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美国软实力走到尽头”——而这恰恰是中国“联合更多国家的绝佳窗口”。[66] 王景贤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论证了中国选择的独特性。他认为，“国际政治不能模仿”。他引用中国文化自古讲究的“大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德报怨”，强调“特朗普违背国际法的强

[65] 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丛林法则只是插曲，中国面对的是“代序崛起”的历史时刻》

[66]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教授）：《特朗普越造“丛林法则”，中国越要展现全球领导力》

盗做法，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基因所为”。他指出，“中国并非能不能统一台湾，而是在某一时点为统一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67]

（二）中国战略选择的约束条件

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并非由物质实力单一决定，而是深受其经济结构、社会禀赋、历史遗产与地缘环境的复合约束。中国作为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大国、全球最大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拥有复杂周边环境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其战略文化天然地倾向于以经济合作与制度建构而非军事征服与领土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与影响力拓展。这些结构性约束既是对中国战略选择的限制，也是对中国战略定力的保障——它们使得中国的决策者比某些外部观察者所预期的更加审慎和克制，长期秉持以“和”为主线的对外政策。

张家栋从四个维度论证了“中国为何不能学习美国和俄罗斯”。首先是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美国和俄罗斯都是资源型大国”，而中国“经济高度融入全球化，‘两头在外’特征明显”——“石油进口依存度一度超过70%，铁矿石超过80%”。其次是发展阶段的截然不同：“中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转型期”，“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再次是两岸关系的特殊性质：“两岸经济高度

[67] 王景贤（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丛林法则”时代，中国永远站在正义一方》

一体化”，“武力方式推动完全统一……边际收益有限，而风险极高”。最后是国际格局转折期的历史教训：“先动手的一方往往先付出最大代价”。[68]

吴川则从“红线”思维的角度，提出了四个不可逾越的战略边界。第一，“误判实力的可转化性”——中国的力量“并非像美国那样可被频繁用于施压与越界”；第二，“把‘安全威慑’误当成‘秩序塑造’”——“任何显著提升不确定性的行动，都会触发安全对冲”；第三，“加入规则例外化竞赛”——这将“直接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国家中的制度可信度”；第四，“台湾问题的处理逻辑不能出错”。[69]

冯玉军则从战略方针的角度，提出了“乱局之下，宜静不宜动”的审慎建议。他主张“重新挖掘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战略方针的时代价值”。同时，他强调“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促进发展、保障民生上”。[70]

韩荣斌则从“无为”的智慧角度提出了独特建议。他认为，在美国打破自己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格局之际，“中国以‘无为’对美国的‘有为’可能是更优的策略”。“无为非无所作为，而是保持战略定力，以阳谋和大势追求自身战略目标。”他强调：“中美竞争是持久

[68] 张家栋（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为何不能学习美国和俄罗斯》

[69] 吴川（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70] 冯玉军（北京大学教授）：《全球失序，中国何为？》

战，不是速决战，比的是各自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社会的韧性。”[71]

（三）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色

多位学者从中国文明传统出发，探讨了中国外交的独特逻辑。将历史与古典概念直接应用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析时，需要审慎处理几个关键的理论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使源于中国特定历史经验的王道概念获得跨文化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如何避免将文明差异本质化为不可通约的冲突，同时又保持对中国外交独特性的准确认知；如何从历史向现代进行转化的过程中，理清历史对于现今的重大塑造作用。

杨光斌教授指出，一战前和二战前的“丛林世界”的主要玩家就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不同民族国家，“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体或文明体有着与生俱来的帝国主义属性”。但巨大不同的是，如今中国这个“异质体”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杨光斌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这个港湾贴着‘共同安全’的标签，这与‘丛林世界’的‘安全困境’形成鲜明对照”——“两种文明形态塑造的不同的安全同时存在，而不像二战前只有‘安全困境’，共同安全的中国无疑是对冲‘丛林世界’的重要力量”。这一论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当前的国际秩序危机不仅仅理解为权力格局的变动，而是文明逻辑的根本碰撞。杨光斌教授还援

[71] 韩荣斌（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引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的大预言：“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早期形态，中国文明是一种成熟文明，中国文明更适合管理未来的世界。”在他看来，“当下世界秩序演变似乎正在验证”这一预言。这一预言在当下国际秩序剧变的背景下获得了惊人的现实相关性。[72]

赵宏伟提出了一个极具文明自觉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丛林法则从来都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而只有中国游离其外，“虽知世上有霸道，但独创王道，遵循王道贬斥霸道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他将此称为“中国例外主义”的题中之义。在他看来，国际社会急需全球治理机制这一公共产品，“不言而喻，王道模式是唯一选择；又只能由中国引导国际社会建设新国际秩序”。[73] 刘星则从“拆墙与筑墙”的辩证关系切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他指出，“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其前提是还存在一个‘道’，广义言之可理解为规矩，但现在，特朗普的美国却是在破坏这一根本中的根本”。对于崛起国家而言，“最大的考验或许是诱惑”——“当以往始终标榜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的所谓正能量模范变成实打实的负能量的带头人时，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诱惑或许很难抵抗”。[74]

[72]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
[73] 赵宏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丛林法则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 中国是例外》
[74] 刘星（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拆墙还需筑墙人——谁更能破坏秩序？》

（四）两种文明形态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从“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的历史性跨越，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经验命题，更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判断。国际秩序的稳定运行依赖于一系列关键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货币安排、有效的安全冲突管控机制以及应对跨国挑战的集体行动能力。在美国作为传统公共产品主要供给者出现供给意愿与供给能力双重下降的背景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正在急剧扩大，这为中国承担更大份额的供给责任提供了客观需求与制度空间。

杨光斌教授的“两种文明形态”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他深刻指出，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每一次国际秩序的重构都伴随着西方内部列强的争霸与对外扩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文明以“天下”观念为底色，追求“和而不同”的共存逻辑。这两种文明形态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安全范式：前者深陷“安全困境”的零和博弈，后者则致力于“共同安全”的互利共生。杨光斌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秩序的反应者，而是秩序演化的主动塑造者。他以加拿大与中国签订万亿美元自然资源合同、德国向中国开放电动车市场为例，论证了中国正以“发展的方式发展自己并

改变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为“惶惶不安的西方国家似乎找到了安全的港湾”。[75]

公共产品供给并非单纯的能力问题，更涉及复杂的合法性政治——供给者的行为是否被接受者视为正当、供给的方式是否符合受援者的偏好等，都直接影响着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效果。正如孙太一所指出的，“代序崛起”需要中国在“他人放弃规则时坚守规则”，保持长期战略定力。[76]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仅要避免特朗普式的蛮横行径，更要以制度化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预期、可信赖的公共产品。“王道”不是空洞的道德宣示，而是通过具体的国际合作、规则建设、危机管控来体现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便获得了清晰的逻辑。刘洪钟所强调的“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理念，卫娣所论述的“不谋求主导权，而是致力于提供发展动力、安全缓冲与制度支撑”，本质上都是中国文明逻辑在国际关系中的外化表达。在“唐罗主义”肆意扩张、核秩序濒临崩溃的危急时刻，这种文明自觉不仅是中国的战略传统，更是其长期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75]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

[76] 孙太一（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丛林法则只是插曲，中国面对的是“代序崛起”的历史时刻》

七、走向新秩序的路径选择

国际秩序转型的宏大叙事终将由行为体具体的政策选择、外交互动与制度创新等共同推动。在此过程中，学术界的持续观察、深入分析与理性建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为社会提供了反思的空间，为决策者提供了审慎的参照，也为公众提供了理解的框架。综合多位学者的洞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美国，国际秩序面临“失序”与“多序”并存的局面。

尽管特朗普的行为展现了令人震惊的强势，但多位学者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美国越是试图以实力维护霸权，其霸权的根基就越快被侵蚀。特朗普政府扰乱全球价值链、破坏霸权声誉、放大金融风险，系统性地削弱了美国的长期竞争力。并且，美国的承诺能力减退、信誉持续透支，正在加速盟友的战略疏离。与此同时，正如韩荣斌和储昭根所提醒的，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其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创新、金融体系——在短期内仍然稳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它仍然具备一定的特别行动能力。因此，任何对美国霸权的过早宣告终结，都可能犯战略误判的错误。

除了美国自身的不满，当下的国际秩序也面临更加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后冷战时期的单极时刻虽然在权力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但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制度扩散与相互依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体系内部

的结构性矛盾。当繁荣红利逐渐消退、不平等问题日益尖锐、新兴国家的崛起诉求遭遇守成国的抵制时，长期积累的矛盾便以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当下的秩序危机，是矛盾公开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世界政治面临的不确定性虽令人不安，但也为深刻的体系改革与制度创新提供了历史性的动力。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在实力竞争中胜出，更是如何在新秩序的塑造中赢得人心。王景贤的总结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国学者的共识："国际政治不能模仿"。他引用中国文化自古讲究的"大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德报怨"，强调"特朗普违背国际法的强盗做法，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基因所为"。这一审慎理性的态度，与特朗普的莽撞冲动形成了鲜明对照。孙太一的"代序崛起"论、赵宏伟的"王道"论、刘洪钟的"公共产品供给者"论，虽然表述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中国的真正机遇不在于成为另一个霸权者，而在于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源与更好的秩序提供者。

但是，审慎不等于消极。正如冯玉军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不只是全球大变局的被动客体，更是最大自变量之一"。中国需要"改变习以为常的'冲击—应对'模式，转而求诸于己，切实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位置、作用与影响，积极发挥主体性"。杨光斌教授的"两种文明形态"理论更是从文明的高度揭示了，中国之所以

能够在“丛林世界”中提供替代方案，根本在于其文明的逻辑和成熟度与西方帝国主义传统的本质区别。

在这一系列分析和讨论的背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人类社会是否足以应对当前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当下世界既非简单地退回“丛林法则”，也非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的普遍秩序，而是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序并存时代。在这一时代，规则并未消失，而是变得碎片化、区域化、竞争化。霸权并未终结，但其合法性与能力已遭受根本性侵蚀。多极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现实，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的过程。五十六位学者的讨论虽然视角各异、观点多元，但一个隐含的共识贯穿其中——单纯的权力竞争无法带来可持续的秩序，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

本报告所汇聚的五十六位学者的声音，虽然因视角与立场的差异而在具体判断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却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学术共识：对国际法与国际规范基本价值的坚守、对战略定力与长远眼光的强调、对中等强国与全球南方联合的开放性与建设性倡导，以及对中国以具体行动赢得国际信任的殷切期望等。这些共识性判断不仅为理解当前秩序转型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更为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指明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基于对五十六位学者观点的系统梳理，本报告尝试提出面向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五点总结：

第一，国际法与国际规范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如孙雯所援引的布赖尔利的睿见，国际法“既非无用的妄想，亦非万能的神话”，而是“构建更健全国际秩序的一个机制”。在规则遭受挑战时，坚守规则比放弃规则更具战略智慧。

第二，在失序时代，“战略定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吴川指出，“失序时代最大的诱惑，是把他国的越界行为误读为成功经验”。能够在诱惑最强的时候保持清醒，区分“哪些问题需要力量”与“哪些问题需要时间”，体现了大国的战略成熟。

第三，任何以短期实力优势为代价侵蚀长期制度合法性的行为，最终都将面临反噬。特朗普的“唐罗主义”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某些战术成果，但其对美国软实力、同盟体系和全球治理能力的损害是深远的，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合法性。

第四，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的联合不应是封闭性的阵营对抗，而应是开放性的合作网络。卡尼总理倡导的中等强国合作、罗欢镇提出的“没有美国的全球化”，都不应以制造新的分裂为代价。全球南方国家应积极主动发挥战略能动性，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第五，中国的“王道”理念不能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公共产品供给和危机管控能力来赢得国际信任。“共同安全”的理念是中国的重要贡献，需要通过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危机管控对话、发展合作项目等具体实践来落到实处。

本报告所梳理的五十六位学者的洞见提醒我们：旧秩序正在崩塌，丛林法则的诱惑真实存在。但这绝非历史的终局。中国文明的独特智慧——“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共同安全”——正是这个动荡世界需要的“稳定锚”。正如杨光斌教授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已经从“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这一身份转换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影响力，还有更重的历史责任。在“两种文明形态”的碰撞与对话中，中国能否以“共同安全”的理念对冲“安全困境”的惯性，能否以“王道”的实践超越“霸道”的逻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社会能否顺利穿越动荡期，构建更加公正、和平、繁荣的新秩序。

展望未来，本报告所梳理的学术讨论将持续演进。秩序转型期的思想解放效应不应被低估——当原有的政策工具、制度模板、学科路径、理论范式失效时，政策制定者和学界都将逐步开启更具开放性的讨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经验的积累和新理论的涌现，学者们的观点也会不断调整和完善。但无论如何变化，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始终是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学术讨论的总结，更是对未来战略方向的思考与呼吁。

附件：文章目录

杨希雨 国观智库 《第五个国际秩序：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世界大变局与美国同盟体系的消亡》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 《“单极时刻”回归：美国正重塑全球秩序》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丛林法则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 中国是例外》

任　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 《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

石之瑜 同济大学 《国际秩序要是真的失控就好喽！》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

韩荣斌 美国佐治亚大学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冯玉军 北京大学 《全球失序，中国何为？》

王建伟 澳门大学 《特朗普何以能重温 19 世纪的旧梦？》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委内瑞拉模式会在台海上演吗？》

黄旻华 台湾大学 《台湾社会对于大陆武统台湾实力评估的同温层》

张家栋 复旦大学 《中国为何不能学习美国和俄罗斯》

张钧凯 台湾政治大学 《台湾问题边缘化，台海终局脚步近？》

钟厚涛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今日马杜罗，明日赖清德？》

周文星 南京大学 《马杜罗被捕事件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法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作用》

孙　雯 南京大学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看国际法的作用》

杜　进 日本拓殖大学 《日本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里挣扎》

刘江永 清华大学 《2026 年世界格局与中美日对外战略走向》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必须警惕日本以“战略互惠”为幌子步步为营推进“战略遏华”》

张　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高市早苗与中等国家战略的抉择》

段瑞聪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战后秩序与利益共享：因应川普暴走》

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秩序坍塌背景下中国的东亚战略更应理性担当》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 《西方闹“文革”，东方谋发展》

赵建民 中国文化大学 《唐罗主义让美国失去道德制高点》

谢　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进入剧烈动荡期》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霸权与世界变局》

刘佩怡 台湾金门大学 《“唐罗主义”影响的不只是美洲》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丛林法则只是插曲，中国面对的是“代序崛起”的历史时刻》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 《从失序到多序：超越区域霸权与选择支配》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冲动很可能就是忽悠》

吴　川 日本大学 《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继续推进没有美国的全球化》

王　文 中国人民大学 《特朗普越造“丛林法则”，中国越要展现全球领导力》

宗华伟 南京大学 《从国际组织创生逻辑看“和平委员会”》

崔　岩 辽宁大学 《国际秩序重构：规则变更与路径选择》

王景贤 日华作协 《“丛林法则”时代，中国永远站在正义一方》

詹　欣 东北师范大学 《核秩序走向失序：当前国际战略安全的致命困局》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特朗普革命”一场深刻的全球秩序重构运动》

张东宁 东北师范大学 《美国“唐罗主义”的收缩与中国“战略定力”的隔空博弈》

庄伯仲 中国文化大学 《在“媒介帝国主义”视角下，仍是“一超多强”格局》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 《“一超多强”到“准多极结构”：全球权力格局的过渡性特征》

李海默 复旦大学 《美利坚的久远帝国传统》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双重国际秩序引发新风险》

张勇进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西方的终结？》

卫　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 《中国在东亚的定力与担当》

杨恩辉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从周天子势微看当代世界秩序演化——古为今用视角下的未来世界结构判断后霸权秩序时代》

张　畅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法失灵了，还是正在被重写？》

刘西诺 江苏开放大学 《从规则到丛林》

黄海涛 南开大学 《“后霸权秩序时代”国际法的消亡与重生》

赵光锐 南京大学 《美国霸权的“不可靠性”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刘　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拆墙还需筑墙人——谁更能破坏秩序？》

高梓菁 山东大学 《“美国会抽走我们脚下的梯子”：日本对“唐罗主义”的三点忧虑》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国际秩序演变的新趋势：从共同价值观主导向利益优先主导转变？》